

《无问西东》背后的联大先生们

文\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《无问西东》正在全国热映,好评如潮。电影截取了四段故事,其中一段发生在西南联大时期,青年学子或徒步穿行于湘黔滇,或在简陋的教室静坐听雨,或于炮火中辗转昆明郊外——即使山河破碎,烽火遍野,文脉依然不绝,薪火仍旧相传。

之所以如此,是因为在这些学子身后,有一群风骨、气节和学问并存的大师身影。梅贻琦、陈寅恪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钱穆、吴宓、刘文典、金岳霖、冯友兰、沈从文,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,每一个名字都是教科书上的常客。正是这些大师的道德学问,成就了西南联大。



联大常委、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。



联大时期的闻一多先生。



湘黔滇旅行团辅导团的先生们。

湘黔滇旅行团

抗战全面爆发后,北大、清华和南开三校南迁,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。不久战火南延,临时大学分三路再迁昆明,其中两路乘车乘船赴滇,第三路则从长沙经益阳、常德、桃园、芷江、贵阳、安南、镇宁等地,徒步穿越湘黔滇抵达昆明,这支队伍就是抗战初期有名的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。

旅行团共有学生244人,国民政府军委会派黄师岳中将担任团长;另有教师11人组成辅导团,闻一多、黄钰生、曾昭抡、李继侗和袁复礼等5名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,由黄钰生担任主席,后来黄钰生和袁复礼因个人原因退出了旅行团。

1938年2月19日,旅行团举行开拔仪式,第二天正式出发。一艘小火轮拖着两条大木船,载着全体人员从湘江直下洞庭。抵达益阳附近时,旅行团师生登岸开始步行。

湘黔滇旅行团是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大规模走出校门与社会接触,师生对西南一带的民风民俗及人文历史了解甚少,学校便将从北平带出的许多关于西南地区的图书资料拆箱,让有兴趣的老师和学生普及这方面的知识。旅行途中或宿营休息时,辅导团的教授便结合当地山川地理、风土人情进行现场教学,闻一多指导学生收集民歌、研究地方方言;李继侗介绍云南乡村的情况;袁复礼则在湘黔一带讲述河流、地貌的构造和演变。同学们边走边学,兴趣盎然,指点江山,激扬文字,既学到了许多在课本上无法学到的新知识,又领略了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的真正内涵。

3月25日,旅行团到达贵州炉山(今凯里),访问苗寨。第二天举行汉苗联欢会,苗族群众吹芦笙跳舞欢迎,同学们唱歌道谢,李继侗教授舞兴大发,和旅行团医官徐行敏跳了一曲华尔兹;团长黄师岳也舞了一回手杖助兴;曾昭抡教授则和苗族群众斗酒,大醉而归。

到学校后,据好事同学总结,曾昭抡先生走路一丝不苟,途中每遇上下坡必沿公路走之字形,被评为全团走路最多的团员。而闻一多、李继侗经过几个月风餐露宿,胡子已经留得很长,二人约定抗战胜利后再剃掉,但李继侗“晚节”不保,到昆明不久就剃掉了。

闻一多是个浪漫的诗人,当时虽然还不到40岁,但面容老相,所以出发时大家都劝他坐车去昆明。闻一多的好友杨振声开玩笑说:“一多加入旅行团,应该带一具棺材走。”但闻一多一路饱览奇绝的山水风光,非常兴奋,身体也比原来好多了,还拾起了荒废多年的画笔,一连画了几十张素描。此间,闻一多在致妻子的家书中说:“现在是满面红光,能吃能睡,走起路来,举步如飞。”到昆明后,精神焕发的闻一多一见到杨振声就说:“假使这次真带了棺材,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。”说完两人抚掌大笑。

跑警报

西南联大到昆明的头几年,日本飞机经常来骚扰,空袭频繁。就像电影里的场景那样,师生们听到空袭警报就躲到郊外去,一去就是好几个小时,这在当时叫跑警报。当然,联大同学也有不跑警报的,据中文系的汪曾祺回忆,有一位广东同学,一有警报,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,警报解除了,他的莲子也烂了。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,这位同学听着炸弹在不远处爆炸,照旧神色淡定地煮他的冰糖莲子——后来这个细节被电影《无问西东》采用,用到了沈光耀身上。

空袭警报响起后,师生们都躲进郊外的山沟里,那里相对安全些。学生都是20多岁的年轻人,十几分钟就能翻过几个山头;先生们就不行了,一是年龄较大,再说常年在书斋里静坐,翻山越岭非其所长。联大常委、清华校长梅贻琦即使跑警报也穿戴得整整齐齐,手里拿一把折

伯伦式的弯把雨伞,在乱哄哄的人群里安步当车,不疾不徐,非常稳重,还不时疏导、指挥学生们。惊慌失措的师生只要看到梅校长镇定的样子,也就不再慌乱了,秩序也好许多。

关于西南联大的跑警报,坊间和媒体流传着许多段子,最有名的是刘文典和沈从文的故事。

刘文典是研究庄子的,沈从文是作家,在联大讲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,刘文典轻视新文化,认为沈从文没学问,所以看不起他。据说沈从文评教授时,刘文典认为他资格和学问都不够:“陈寅恪是真正的教授,他该拿400块钱,我该拿40块钱,朱自清该拿4块钱,沈从文也就4毛钱。”曾经读过一篇文章,说有一次警报响起,刘文典与大伙一道跑出校园,途中突然想起陈寅恪,于是跑回去找到眼睛不好的陈寅恪,扶着他向外跑,一边跑还一边喊:“保存国粹要紧!”刘文典看到沈从文也在人群里,便呵斥道:“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,我跑是为了保存《庄子》,你跑什么!”

这段文字写得绘声绘色,非常形象。但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却提出了不同意见,他在《我的父亲刘文典》中回忆,当时刘文典住在昆明龙翔街,为了跑警报方便,专门让人在郊外虹山挖了一个小防空洞,刘文典和家人、学生在洞里躲避,有时还和学生读读书、谈谈学问什么的。而沈从文住在丁字坡,跑警报一般是到英国花园一带,与刘文典所在的虹山相距甚远,两人是不会遇到一起的。刘平章在文章中气愤地说:“我觉得那时敌机要来了,大家都是慌慌张张地跑,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还能说出‘你跑什么?我跑是为……’这样的话,估计那已经不是一个正常人了。不知道是谁编出来的这个故事,而且沈从文评教授的时候,父亲已经离开联大到了云大,所以并不存在这个问题。”

课堂上的教授

西南联大的学术风气非常

自由,教授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学生的需要编写教材和讲义,他们讲课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,非常有趣。曾在联大就读的历史学家何宗武在《上学记》中写道:“比如中国通史,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,听课的人多,钱穆、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,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,内容也大不相同。”

闻一多先生讲授中国古代神话非常“叫座”,不只是文学院的学生来听,就连工学院、理学院的同学都来抢座。闻一多讲课图文并茂,他会绘画,常用毛边纸画出伏羲、女娲等各路神仙,钉在黑板上,口讲指画,有声有色,引人入胜。闻先生讲课还有一个特点,上课时先点上烟斗,同学们也相继拿出香烟,互相让烟,课堂上下烟雾缭绕,其乐融融,一派神仙景象。

金岳霖是教逻辑学的,人们都叫他老金。逻辑学是大学新生的必修课,学生很多,上课在大教室。金先生有时要提问,但那么多的学生不可能都叫上名字,所以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:“今天,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。”于是所有穿红毛衣的女同学都有点紧张,也有点兴奋。

金先生开了一门“符号逻辑学”的选修课,晦涩难懂,教室里学生不多,其中最突出的是一个叫王浩的同学,经常向金先生请教。金先生讲着课,有时也会突然停下来问:“王浩,你以为如何?”王浩也不客气,站起来讲一通,其他学生插不上话,整堂课几乎成了师生二人的专场。

金岳霖喜欢读通俗小说,他和沈从文私交很好。有一次沈从文拉他去给学生讲一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,大家都很期待,以为金先生一定会有高论。不料金岳霖讲了半天,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任何关系,让沈从文和同学们大失所望。

陈寅恪在联大讲隋唐史和魏晋南北朝史,陈先生名气大,是清华四大导师之一,所以很多同学趴在窗子外面听他讲课。陈先生上课时夹着一个布包袱,里面包着书,但他基本不看,开口就是哪本书中的哪一段,原话是什么。陈寅恪讲的东西太专业,引用的资料同学们也都没见过,所以基础差的一般听不懂。陈先生在联大待的时间不长,后来去欧洲治病,恰逢欧战爆发,便滞留在了香港。

而陈寅恪密友吴宓教授讲课又是另一番景象,吴宓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开拓者,又是红学专家,经常为同学们开《红楼梦》讲座。吴宓留学出身,非常绅士,对女士特别尊重,开讲座时看到有女生站着,就马上出门,去别的教室搬椅子,直到所有女生都坐下方才开讲。听过吴宓讲课的汪曾祺回忆说:“吴先生讲课内容如何,不得而知。但是他的行动,很能体现‘贾宝玉精神’。”